

戴震《〈尔雅文字考〉序》考伪

周 德 美

《〈尔雅文字考〉序》一文最初见于孔继涵微波榭刊《戴氏遗书》，后段玉裁经韵楼所刊《戴东原集》、《安徽丛书》编印处所刊《戴东原先生全集》及现行其他刊本，尽皆收载。这篇文章提出“儒者治经，宜自《尔雅》始”^①的著名论断，倡导“援《尔雅》以释《诗》《书》，据《诗》《书》以证《尔雅》”、“旁及先秦已上凡古籍之存者”、“而又本之六书、音声”^②的训诂原则，在中国学术史上、特别是在经学史和训诂学史上，影响极为深远。

笔者曾长期参与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课题——《中国古籍提要·语言文字卷》的编纂工作，1994年在为任基振《尔雅注疏笺补》撰写提要时，首次发现任氏《尔雅注疏笺补》自序与戴震文集内的《〈尔雅文字考〉序》几乎一字不差。全文不长，兹转录于下，以便分析：

古训故之书，其传者莫先于《尔雅》。六艺之赖以明也，所以通古今之异言，然后能讽诵乎章句，以求适于至道。刘歆、班固论《尚书》古文经曰：“古文读应《尔雅》，解古今语而可知。”盖士生三古后，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，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，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，而仍留疑义，则时为之也。余窃谓儒者治经，宜自《尔雅》始。取而读之，殚心于兹十年。是书旧注之散见者六家：犍为文学、刘

歆、樊光、李巡、郑康成、孙炎,皆阙逸,难以辑缀;而世所传郭注,复删节不全,邢氏疏尤多疏漏。夫援《尔雅》以释《诗》《书》,据《诗》《书》以证《尔雅》,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,综核条贯,而又本之六书、音声,确然于训故之源,庶几可与于是学,余未之能也。偶有所记,惧过而旋忘,录之成帙,为若干卷题曰《尔雅注疏笺补》,亦聊以自课而已。若考订得失,折衷前古,于《尔雅》万七百九十一言,合之群经传记,靡所扞格,姑俟诸异日。高邮任基振^③。

与孔本比勘,只有三处异文:一为“先秦以上”,戴集作“先秦已上”;一为“若干卷题曰《尔雅注疏笺补》”,戴集作“题曰若干卷《尔雅文字考》”;一为“聊以自课”之前,戴集多一“亦”字。^④两篇文章篇幅近四百仅寥寥数字不同,其中必有一伪。鉴于戴震的学术地位以及《〈尔雅文字考〉序》在训诂学史上的影响,又考虑到孔继涵和段玉裁一为戴氏亲家(孔氏之子广根为戴震女婿)、一为戴氏学生,且谢启昆的《小学考》著录戴、任二家雅注时仅辑录《〈尔雅文字考〉序》,而并未辑任氏自序,所以当时那篇提要推定那是“窃戴序为任序”,“疑任氏之后浅薄之徒所为”。

最近,有幸得见北大图书馆所藏《戴氏杂录》写本,其《古训》一篇,竟与任基振《尔雅注疏笺补》自序全然相同。该文初以端楷写定,正文至“录之成帙”结束,后复以行草改乙十四处。其中“千百年”、“千百里”二语“千”前原有“数”,“偶有所记”前原有“×诵习漫录”,“而旋忘”前原有“时”,后原有“成若干卷题曰《尔雅笺补》”,均被圈去;“郭注,复删节不全,邢氏疏尤多疏漏”原作“郭注、邢氏疏尤多疏漏,不可无补正”;“阙逸”前“皆”字,“旁及”前“由是”,“六书”后“音声”,“为题曰若干卷”至文末,均为改动时所加。其中,“为题曰若干卷《尔雅注疏笺补》,亦聊以自课而已。若考订得失,折衷前古”初改作“为《尔雅笺补》若干卷,亦聊以自课而已。若谓考订得失,折衷前古,姑俟诸异日”。^⑤

此稿见于《戴氏杂录》，初看起来，似乎可为“窃戴序”一说再添力证，其实不然。从种种迹象分析，它反而应该是任基振《尔雅注疏笺补》自序的修改稿。

首先是篇名问题。《戴氏杂录》所题《古训》，值得怀疑。原稿有栏框行格，“古训”二字题于框外，这不符合古代写刻行款常规。而且，戴震一般也不惯用有框格的纸。检《戴东原先生文》《戴氏杂录》所收戴氏手稿，仅《于敏中寿颂》一篇有行格。就笔势而言，此二字左倾，与改乙行草类似，实非原题；或者说其文原本无题，此二字当为修改者所加。考察篇中内容，“余窃谓”、“余未之能”等语说明这是一篇自序，自序附书而行，一般不必加篇名，除非序文另行。即使另行，其命名格式当为“××序”、“××自序”，而不会仅以“古训”二字作为题目。那么，修改者为什么要添加“古训”二字呢？细审全文本身，纵使该篇不属于序文，以“古训”为题也有失宽泛。此二字与正文首二字相同，窃疑只是草稿中临时取用以作标识，以防与其他文稿混淆，并非正式标题。今天所见到的《尔雅注疏笺补》自序正好也没有标题。

其次是书名问题。自序总是为特定书而作的，稿中修改表明，其书原题《尔雅笺补》、后改定为《尔雅注疏笺补》。改定名和现在所见任著书名完全一致。任著诸序也可印证书名的这种变动。任氏此著，戴震、金兆燕、李时沛、^⑥任兆麟、鲁九皋都曾为之作序。戴序篇名径题《〈尔雅注疏笺补〉序》，金兆燕、任兆麟二序篇中提及的书名也都是《尔雅注疏笺补》。鲁序还说：“吾友高邮任君领从，……尤尽心于《尔雅》一书，尝病其注疏繁简未称，每读书有所得，辄笺补其下，……今年以书来，曰：‘《笺补》成矣，子可以序矣。’”^⑦这明确告诉我们，任氏的初衷就是为《尔雅》“注疏”作“笺补”，所以命名为《尔雅注疏笺补》自在情理之中。同时，说“《笺补》成矣”，而没说“《注疏笺补》成矣”，也意味着最初书名可能就是《尔雅笺补》。鲁序、任兆麟序的篇名正作《〈尔雅笺补〉序》。诸序关于成书的过程的

描述与此也是一致的。鲁序说“每读书有所得，辄笺补其下”，《古训》（为行文方便，仍以此作篇名，下文同）说“偶有所记，惧过而旋忘，录之成帙”；任兆麟序说任氏“殚心于兹十年，成《尔雅注疏笺补》”^⑧，《古训》正有“取而读之，殚心于兹十年”之语，这说明《古训》所述及的作者经历其实就是任基振的经历。

那么，有没有可能是戴著《尔雅文字考》原题《尔雅笺补》或《尔雅注疏笺补》呢？我们可以从成书时间方面来考察。任著《笺补》，初稿成于乾隆丙戌（1766），乾隆壬辰（1772）以定稿向戴震请序。^⑨戴氏《文字考》，段玉裁推测成于戊辰、己巳、庚午（1748—1750）年间，这似乎比任著早出许多。然而段氏所依据的，一是戴震“丁酉正月与段玉裁书”中“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”一语，一是戴集《〈尔雅文字考〉序》中“殚心于兹十年”一语，以为从十七岁起潜心训诂，历经十年，遂成其书。此说显系盖然之辞，所以段氏自己一开始也说“未知何年所成”。^⑩而在任兆麟序中，则明言：“震著《尔雅文字考》，多引其说。”^⑪这可能是亲眼见过《尔雅文字考》。《清史列传》卷六八所附“任基振传”亦有此语。任兆麟、任基振、任大椿属于族兄弟，三任与戴过从甚密，任兆麟还曾为戴震编选《制义》一书，其说应当不会有偏颇。由此看来，戴震《文字考》成书当在任著《笺补》之后。既然戴著晚出，此前戴氏又曾两度审阅任基振《尔雅注疏笺补》，自然也就没有理由将自己的著作也命名为《尔雅笺补》或《尔雅注疏笺补》。

再其次，稿本中的雅学观点也值得注意。关于《尔雅》属性及其同诸经的关系，稿本中指出：“余窃谓儒者治经，宜自《尔雅》始。”这是认为《尔雅》与诸经关系密切，从而将它作为通经工具。任基振正有类似看法，他曾告诉鲁九皋说：“古者，《尔雅》为六经义疏，读六经之辞不得其解，则从而求之于此，此书不注可也？今学者既莫能遍读诸经、又经文为诸说所晦者多，则必先假道于是。盖文义明然后以此求经传之辞，条理伦贯，可以廓然无碍矣。故余尽心于是，为

读经者导之先路焉。”^⑫“《尔雅》为六经义疏”、读经“必先假道于是”与“儒者治经,宜自《尔雅》始”相较,区别仅在于措辞不同而已。这一点可以进一步印证上面的看法。

稿本中还涉及《尔雅》郑玄注问题。篇中说:“是书旧注之散见者六家:犍为文学、刘歆、樊光、李巡、郑康成、孙炎,皆阙逸,难以辑缀。”这里涉及到雅学史上的一桩公案,即郑玄是否作过《尔雅注》。清人余萧客《古经解钩沉》(成于1762年,后收入《四库全书》)据《周礼疏》所引辑录《尔雅》郑注一条,并在《古经解姓氏书目》中明确著录郑玄《尔雅注》。后邵晋涵、严可均、龚自珍、胡元玉、李曾白、许森等与唱和,而孙志祖、阮元、臧庸、叶蕙心、谢启昆、陶方琦等又相继怀疑和否认,现当代名家多置之勿论。至于戴震,其《经考附录》卷六《尔雅》条先后两次摘引邢昺《疏》,一次引邢昺《疏》叙说:“其为注者,则有犍为文学、刘歆、樊光、李巡、孙炎。”另一次引邢昺《疏》文说:“邢昺曰:‘陆德明《叙录》:“犍为文学二卷”、“刘歆三卷”、“樊光六卷”、“李巡三卷”、“孙炎三卷”。惟此五家而已。又《五经正义》援引有某氏、谢氏、顾氏,今郭氏言十余者,典籍散亡,未知谁氏。’”^⑬均未及郑玄注。《经考附录》属于读书札记,对于所录旧说间加按语,以为去取。如“易彖象三字皆六书之假借”条,条末即有按语驳斥破“易”为“蜴”、“日月为‘易’”诸说。^⑭这里摘抄邢《疏》,对其未及郑玄注却没加附任何按语。如果戴氏认为存在郑玄《尔雅注》,对邢《疏》的观点断然不会无动于衷。所以这正好表明戴震实际上默认邢《疏》的看法。这就是说,《古训》或者《〈尔雅文字考〉序》中关于郑玄《尔雅注》的观点,与戴震的实际看法也应该是相左的,戴震不可能是《古训》的作者。

总之,从《古训》的修改状况和它作为自序所序对象及其所显示的成书过程、作者经历、学术观点等方面的情形,结合相关材料进行分析,表明它无疑就是任基振《尔雅注疏笺补》自序的改定稿。那么,任序是怎样变成戴序的呢?《〈文字考〉序》始见于微波榭刊十

卷本文集。戴氏文集，洪榜《戴先生行状》称四卷，王昶《戴先生墓志铭》称六卷，说明初无定本。其子中立致段玉裁书又载：“古文时文集六卷，俱孔公处。”^⑤孔公即指孔继涵。这篇书信是在戴震逝世后写的，六卷本当为戴震手定。但孔氏最终刻为十卷，必定增添不少的文章，估计《〈尔雅文字考〉序》亦为所增。那么，其底稿究竟从何而来呢？考戴集此序内“为题曰若干卷”一语，任序中作“为若干卷题曰”。此处异文可以从《古训》中得到解释。在《古训》中，“若干卷”是以换位号前移的，而“题曰”恰巧也在前移处添加，其与“若干卷”的位置关系非常模糊，于是“若干卷”可能移到“题曰”之前，也可能移到“题曰”之后。任序和《〈尔雅文字考〉序》所表现的就是这两种可能，这说明它们都同祖于《古训》。除此以外，就篇中文字而论，任序全同，戴序独异，显然是戴序的刊刻者更改了篇名和篇中的书名。当时，孔府存戴震稿本十余种，《尔雅文字考》适在其列。戴震很少为自己著作作序跋，今《安徽丛书》所收二十二种即有十九种无自撰序跋题记，《尔雅文字考》一稿可能也没有。大概从戴氏其他文稿中发现“古训”一篇属于研治《尔雅》的自序，且上有戴震改乙的手迹，就同手头的《尔雅文字考》联系起来，误认作该著自序初稿，因而替换掉原有的书名，改题《〈尔雅文字考〉序》，收录在文集之中，于是无形中成为造伪者。

附注：

①②《东原文集》卷五，孔继涵辑《微波榭丛书》，乾隆间刊本。

③⑥任基振：《尔雅注疏笺补》，稿本，上海图书馆藏。朱祖延先生主编的《〈尔雅诂林〉叙录》（湖北教育出版，1998）曾据以排印，但刊落卷首自序和戴、金、李三序。戴序另见戴震文集。

④此外，“古训故之书”、“训故之源”，段、孔两本亦有不同：“源”，段本作“原”。“训故”段本作“故训”，不过这属于讹误。段玉裁为《戴东原集》所作《覆校札记》指出：“‘古故训’本作‘古训故’”，“刻版既成，不欲多剜损”。

⑤《戴氏杂录》，稿本，北大图书馆藏。

（下转219页）

①⑦上海：世界书局，1935。按，此书所收几种子弟书作品的作者认定有误，参见陈锦钊《子弟书之作家及其作品》，载《书目季刊》（台北），12：1—2，1978·9。

①⑧见《曲艺论丛》，北京：中国曲艺出版社，1982，页127。

①⑨参见仇江、张小莹编《车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》、仇江《〈清蒙古车王府曲本〉遗珠杂谈》，载同⑨。

②⑩参见路大荒《整理蒲松龄诗文杂著俚曲的经过》，载《蒲松龄年谱》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1980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刘水云：温州师范学院

车锡伦：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

（上接205页）

⑦⑫鲁九皋《山木先生文集》卷五，道光十一年陈用光刊本。

⑧⑪任兆麟《有竹居集》卷五，嘉庆元年两广节署刻本。

⑨戴震：《尔雅注疏笺补序》，《东原文集》卷五，《微波榭丛书》本。

⑩段玉裁：《戴氏年谱》，《四部丛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，291册。

⑬⑭《经考附录》卷六，卷一，《安徽丛书》第六期，《安徽丛书》编印处，1936。

⑮《戴先生遗墨》附，《安徽丛书》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大学图书馆古籍室